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黄 长 义

(武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黄长义 (1965-),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

关键词 考据 经世 嘉道之际 学术转向

内容提要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 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中图分类号 K24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 (1999) 03-0075-06

乾隆六十年 (1795), 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 给“承平六十年”的“乾隆盛世”划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 清朝的历史由此滑向嘉、道以降的“衰乱之世”,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政事如河、如漕、如盐, 以及吏治、财赋、戎政, 无不积弊丛生; 而白莲教、天理教起事于中原腹地, 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边陲, 英吉利凭陵于东南沿海。伴随着世运的潜移, 学术思潮也发生着剧变。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考据之风逐渐衰落, 沉寂达百年之久的经世致用学风再度昂扬起来, 并蔚然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潜心考据的汉学家开始关注风俗人心, 颂法程朱的理学家也讲起经济事功, 并出现了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今文经学派。对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原因,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倍受关注, 且多有发明^①。但对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具体过程, 却不够重视, 缺少深入的研究。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嘉道之际的三种主要学术即“汉学”、“宋学”、“今文经学”的变迁过程的具体考察, 来观照整个嘉道学术由考据转向经世的总趋势。

一、“汉学”的衰落与蜕变

所谓“汉学”, 是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 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②。此种学风兴起于清初, 流行于乾、嘉二朝, 尤以乾隆中期为其鼎盛期。所以, “汉学”又往往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乾嘉汉学按其流派主要可分为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好博尊闻, 崇奉汉儒; 皖派则重精审, 贵创造, “实事求是, 不偏一家”^③。两派风格虽不尽一致, 但“说经皆主实证, 不空谈义理”^④。其总体性学风都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 由训诂以求义理”^⑤。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 以致“家家许、郑, 人人贾、马”^⑥, 考据之风充满国中, 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在当时的学者看来, “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 则义理自现, 道在其中矣”^⑦。

客观地说, 汉学家“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 由训诂以求义理”的治学方法确有一定的科学性, 但说“非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⑧, 就过分夸大了训诂的作用, 其片面性显而易见。正如颜元所说: “书之文字固载道, 但文字不是道; 犹车载人, 车且是人?”汉学家的最大失误就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字与义理的关系, 将训诂、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 而忽视了“义理有时实在语言文字之外”^⑨。因此, 他们往往抱小遗大, 流于琐碎。汉学家们本来的目的是想“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⑩, 所以汉学的学术内容, 在吴派固然重在追寻三代制度, 而皖派更是犹精于“三礼”的考证。然而除个别杰出者外, 绝大多数汉学家一生都疲精瘁神于文字, 繁称杂引, 沉溺于考据之中而不得所归。一字聚讼, 动辄数千言, 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 无一念及于用”^⑪。因此, 早在乾隆中后期汉学正炙手可热之时, 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就对

汉学流弊提出了批评。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汉学家的考证论辩虽然“微实不诬”,但往往在“嗜博”中“失之拘执”^①,“一字音训动辩数百言”,恰似“散钱满屋”,“未及排贯”^②。因此,主张兼采汉、宋,以救正其弊端。而戴震、汪中、章学诚更是出身于汉学又超越汉学,以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开一代学术新风。

戴震既是清代汉学的一代宗师,同时也是致力于从考据中开出义理以明道救世的先驱。一方面,戴震继承和发展了顾炎武的“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朴实学风,在文字、音韵、考证、训诂及校勘诸方面成就卓然。另一方面,戴震又“不随时俗”,株守于博雅考订、训诂名物一途,而是高扬顾炎武“明道救世”的旗帜,一生“志存闻道”。他以“字义疏证”的形式,对高踞庙堂的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鞭挞,全面阐发和论证了“欲出于性”、“理存乎欲”的新义理观,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③的王道政治主张。

汪中一生致力于“用世之学”,而耻为无用之学。“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④在治学中,汪中不斤斤于字训句考,而重在“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⑤,对社会现实表示强烈的关心。他考证《周礼》,是因为“婚姻之道可以观政”^⑥;他研治墨学,是因为墨学能够“救衰世之弊”^⑦。他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因此对治水、修桥、农桑、商税等有益于民生的学问都很重视。而正是基于对民生的关注,汪中主张建立各种社会赈济机构,如贞苦堂、孤儿社、养济院、育婴堂等,来“恤老慈幼,以周万民艰扼”^⑧。这种以民生为学问之本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经世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

主张学术经世,是章学诚的为学宗旨。他认为如果学问不用于经世,文章不用于明道,则学问、文章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章学诚之所以强调学术必须经世,是因为在他看来,学术乃政教所系,学术坏而政教必衰,而能够匡正人心、持世救偏的也唯有学术。他说:“学业所以经世也……学业者,所以开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经久而无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⑨因此,章学诚一生以匡正学术为己任,希望通过挽救当时的学术偏弊,来扭转当时吏治腐败、人心乖离的社会风气。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中,章学诚“逆于时趋”,对当时“攀绩补苴”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都进行了深刻批评,提出了“六经皆史”和“因史明道”的著名命题,试图重新高扬浙东学派的经世学风。

上述诸学者的思想潜动和学术主张,虽然在当时备受冷落,但实开嘉道之际学术转向之先河。乾隆末年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太平盛世”已成明日黄花,整个社会呈现出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社会动荡的乱世景象,学者们再也不可能“镇日书帙校勘劳”了,汉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已不复存在。而同时,在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汉学显得苍白无力,其“烦琐碎裂”、“不

适于用”的流弊暴露无遗。于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⑩。在此一形势下,汉学内部也发生着种种蜕变,呈现出内部更新的趋向。

其一,从考古转向通今。一些汉学家一改过去与现实社会政治的疏离,积极地关注、研究、参与时政。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到西汉今文经学,寻求微言大义,从而援经议政,以经术为治术。我们将在第三节专门讨论此一倾向,这里暂且不论。另一种是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研究现实问题。此一倾向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洪亮吉身上。洪亮吉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其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⑪。然而,洪亮吉又与一般汉学家有所不同,于考证经史之外,对当世之务甚为关注。对当时十分严重的人口问题作了深入地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平对策。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他无所顾忌,大胆地予以揭露和抨击,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烽火连天,洪亮吉上《平邪教疏》,“指陈规画,慷慨千余言”^⑫。嘉庆四年,乾隆驾崩,嘉庆亲政,洪亮吉又大胆上书,直言进谏,指斥朝廷弊政,罗列内外官员罔上负国者40余人,责备嘉庆受“群小荧惑,视朝稍宴”,希望嘉庆改弦更张,亲贤任能,励精图治,“一新天下耳目”^⑬。因其言词过于急切,引起嘉庆的盛怒,一时几遭杀身之祸。当时,值康、雍、乾大兴文字狱之后,士大夫相率钳口结舌,不敢稍议时政。洪亮吉不仅大胆地议论朝政,而且公然批评当朝天子,这种勇气确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及,于当时士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其二,从考据回归义理。一些汉学家对当时盛行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深为不满,主张以训诂求义理。根据所求义理的不同,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继承戴震的思想,致力于新义理观的疏证,其代表为焦循;二是继承纪昀的思想,主张汉、宋兼采,调和汉、宋,其代表为阮元。焦循虽属于汉学家阵营,但却对拘守汉儒传注、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十分不满,认为“考据之名,不可不除”^⑭。他批评道:“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惟许、郑。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专执两君之言以废众家,或比许、郑而同之,自擅为考据之学,吾深恶之。”^⑮因此,主张融会众说,以纠正当时学术界据守一隅的积习。焦循虽非戴震的及门弟子,却深得戴学精神。他最佩服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认为这本书最能代表戴震的“生平所得”^⑯。曾作《申戴篇》,以发明戴学义旨,一生治学,以戴震为楷模,致力于新义理观的疏证。其代表作《孟子正义》,即是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基础上著成的。

阮元曾创办学海堂、汇刻《皇清经解》,有汉学“护法”之美誉。针对汉学界株守考据的流弊和学术界对汉学的非难,阮元强调以训诂求义理的必要性。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鄙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⑰既反对摒弃训诂、直求义理的倾向,又反对“但求名物,不论

圣道”的倾向，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⑧。

明道的目的是为了经世，因此无论是焦循还是阮元，都十分强调学以致用。焦循认为，“习先圣之学”是为了“立正身经世之法”，学而不用“非圣学也”^⑨。阮元则非常推崇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而又“留心于经世之务”的学风，主张把“稽古之学”与“政事之学”结合起来，以达到“鉴古以资治”的目的^⑩。这种把问学与致用相结合的思想，既是对乾嘉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学不重用流弊的批判和矫正，也是对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和颜元“习行”思想的恢复和发扬。

其三，从治经过渡到治史。汉学的学术内容本以经学为中心，史学仅为经学附庸。因此，“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则茫然而不知”^⑪。18世纪中叶以后，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将起初在经典考证中运用的方法推广于史学研究之中，他们的努力成功地恢复了史学的声望和地位，把众多学者吸引到史学领域。史学地位在学术界迅速上升，与经学几乎分庭抗礼。经学为体、史学为用的界限受到质疑。如王鸣盛认为，经与史“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⑫。钱大昕则进一步提出了“经史非二学”的命题，将经学与史学同等对待^⑬。而正是在此基础上，章学诚提出了他的“六经皆史”说，从而最终把六经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当时一般史家都以考据治史，集精于博考古史，但是史学较之经学更能切近人事。所以，尽管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一再宣称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⑭，但在他们自己的史学著作中，“驰骋议论”、借古喻今之处却时有所见。尤其是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力图超越狭隘的史学考证，举凡“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⑮，皆著于编。所以，钱大昕推崇《廿二史劄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⑯。赵翼自题记诗云：“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⑰由此可见他的一片用世之心。嘉道之际，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士大夫懷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以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⑱

上述动向表明汉学在嘉道之际已发生了某些质变，此时汉学虽然仍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派别，但学者们对汉学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态度已日渐不满，对经世主张和经世实学日趋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终生埋首考据的学者已认识到乾嘉汉学这种学术路径于世无甚裨益的弊端。如段玉裁晚年，慨叹自己一生“喜言训故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最终落得个“老大无成，后悔已晚”^⑲。他在去世前不久读到外孙龚自珍纵论天下利病的经世雄文《明良论》时，大加赞赏：“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⑳一代考据大师的慨叹和赞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学术转向的大势。

二、“宋学”的复兴和“汉宋之争”

这里所说的“宋学”，主要是指程朱理学。清朝沿袭明制，崇程、朱为正统，科举考试“一宗朱子”，因此在有清一代宋学一直高踞庙堂。然而，经过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批判之后，知识界已很难再建立起对理学的虔诚信念。“其沾沾而谈程朱者，不为势利之徒，即为陋儒”^㉑。章太炎在清末总结清代学术史，已指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有余华”^㉒。乾隆以后，汉学渐盛，“治宋学者已黜”^㉓。宋学仅仅成为士子们科举入仕的敲门砖，一旦成功即弃之而转治它学。据昭梈《嘯亭杂录》记载：“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詬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储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费本耳！’”^㉔连一些宋学家如王白田、李穆堂等人也深受汉学考据风气的影响，以考证来讲义理。但随着清王朝的由盛转衰和汉学流弊的充分暴露，宋学又逐渐活跃起来。姚鼐、方东树、李元春、潘德舆、管同、唐鉴、倭仁、夏炯、李棠阶、吴廷栋等人，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对汉学施以最猛烈的攻击。他们从儒家的德治主义传统出发，把清王朝衰败的根本症结归因为“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认为排斥程朱理学的乾嘉汉学应对此负责。如潘德舆说：“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殆无一不取而效之。……今人不满意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吻合圣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诚不为未见。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学有所不备，而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孔孟以后必不可无之。……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宗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乎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㉕因此，在他们看来，“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㉖。所谓“恃学术”，就是依靠程朱理学来维护纲常礼教，规范社会，匡正人心。

早在乾隆年间，“桐城派”的奠基人姚鼐即对乾嘉学派的纯考据学风十分不满，主张“因文见道”，以孔、孟、韩、欧、程、朱之道统自任，与汉学相抗衡。他继承发展了其乡先辈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理论。他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㉗既肯定了以义理为核心的宋学，又吸收了以考据见长的汉学，而又批评了“言义理之过者”和“为考证之过者”所造成的芜杂、繁碎等弊病，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㉘。姚鼐的主张在嘉道之际得到广泛地信守奉行，

“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⑧。其成就卓著者主要有安徽的方东树、姚莹、刘开、戴均衡，江苏的管同、梅曾亮、吴德旋，江西的吴嘉宾，广西的朱琦、龙启瑞，湖南的曾国藩、孙鼎臣、吴敏树、郭嵩焘等人。其中，方东树、姚莹（一说刘开）、管同、梅曾亮号称姚门四大弟子，名重一时。桐城派的崛起，对于嘉道之际宋学的复兴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在方东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方东树青年时代即师事姚鼐，专攻古文，成为姚门著名弟子。中年后改治学术，以朱子为宗，强调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地位，反对所有程朱理学的对立派，尤其对汉学的抨击不遗余力。道光初年，他写成《汉学商兑》一书，全面、系统、尖刻地批判了汉学，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⑨慨叹汉学的兴起，败坏了一世学风。他甚至认为，汉学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胜过“杨墨佛老”、“洪水猛兽”：“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说横行，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学士大夫之学术昧，则生心发事害政，而野人无噍类矣。”^⑩他从捍卫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对汉学作了系统的批判。所论虽然充满了门户之见，但旗帜鲜明，言词犀利，颇能切中汉学流弊，如一缕清风，给那些长期困扰于汉学的士子打开了一扇思想的天窗。因此，《汉学商兑》的刊行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它改变了以往宋学在汉宋对峙中处于守势的地位，使汉宋之争出现了新的变化，成为宋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识。不仅如此，方东树的主张还影响到桐城派后来的发展路向。在他之后，众多桐城派古文家皆潜心于性理之学，使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成为嘉道之际宋学复兴的一支骨干力量。

除桐城派外，湖湘学派也对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湖南自南宋张栻、朱熹讲学岳麓，即便播下了理学的种子，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重视义理之学的传统。乾隆年间，“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都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⑪，形成独特的湖湘学派。嘉道之际，湖湘学派成为宋学复兴的一大重镇，涌现出了像唐鉴这样的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大家。

唐鉴治学宗主程朱，潜研性道，笃敬力行，一时推为醇儒。累官至布政使，致仕后主讲金陵书院，以著述讲学有名于时。在他由布政使内召为太常寺卿时，许多达官名流如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垵、曾国藩等都从其考德问业，声誉颇隆。唐鉴辨学甚严，对陆王心学、汉学都持反对态度。道光二十五年，著成《国朝学案小识》一书，分为“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五大部类，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总结清代学术史，提出了一个以陆陇其等四人为正宗的清代学术谱系，极力维护程朱道统；批评陆王心学是“障于内”的空谈之学，汉学是“蔽于外”的

守残之学，认为正是这些“i皮辞邪说”的泛滥导致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所谓“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i皮辞邪说之中也”^⑫。在他看来，能够挽救统治危机的，惟有“格致诚正”的程朱理学。其卫道面目跃然纸上。梁启超曾批评该书“主观太重”，“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⑬。这一评价从反面说明了唐鉴此书在嘉道之际宋学复兴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嘉道之际宋学的复兴，与宋明时期不同，其重点不在对性理义蕴的阐发，而是着重强调程朱理学的经世功用。因此，宋学的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总趋势。然而，把当时的社会危机简单地归约为道德的危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皮相之论，宋学家们的一些经世主张看似高明之至，但一涉政务，便空疏之极。因为理学式的自我道德修养和道德重建丝毫改变不了当时所面临的总体性制度危机，而“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櫓”（倭仁语）更不可能在对外战争中“折冲樽俎”、“制敌之胜”^⑭。嘉道之际的一批治世能臣，如严如煜、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他们在实际的经世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程朱理学在经世实务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他们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又非常重视外在事功，积极讲习经世致用之学，主动地以经世实学济宋学“外王”之不足。他们在当时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贺长龄，他延聘魏源至幕府，同辑《皇朝经世文编》，集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以供有志经世者取资借鉴。在当时考据学风仍风靡于世的情况下编辑并刊行此书，显然具有别树一帜的意义，于当时的学风转变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晚清汉学大师俞樾说：《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乎家有此书”^⑮。而在他们稍后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经世济民）的重要性，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学并举的观点，创立了“合汉宋、兼虚实”的经世“礼学”。这是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

三、“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为传习儒家经典的学派，大体上说，今文经学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每每援经议政，故“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⑯；古文经学则侧重于名物训诂，分析经典文义，学风比较朴实^⑰。乾嘉汉学尊崇的实际上是后起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则自东汉末年以后既长期湮灭不彰。在嘉道之际，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刘逢禄揭橥于前，龚自珍、魏源光大于后，予晚清思想学术以极大影响。

在清代，首先重新开启今文经学门径的，是乾隆年间的庄存与。庄存与治经不拘汉、宋门户，不为烦琐笺注之学，重在发挥“微言大义”。其学术风格既和宋元以来所讲的义理之学不同，也与当时精研训诂形声的吴、皖两派迥然有别，“在

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⑧。庄存与毕竟只是个开风气的先导者，虽重“微言”，但体例尚不严密，其学也不大行于时，“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孔检讨及子孙数人而已”^⑨。邵晋涵不以今文经学名家，而孔广森虽讲公羊，但所得不深，未能脱离汉学羁绊而自名其学。直到刘逢禄，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

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危机四伏的嘉道时期，为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方案，“一意志学，洞明经术，穷极义理”，“孜孜从事公羊家言”^⑩，发扬了外家庄氏之学。刘逢禄鲜明地揭起今文经学的旗帜，认为《春秋》“垂法万世”，能“救万世之乱”，为“五经之管匙”^⑪，而《春秋》三传中能够“知类通达，显微阐幽”的只有《公羊传》。所以，他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经学的统绪，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其中，对汉代今文经学家何休的公羊学尤为推崇，盛赞何休“传经之功，时罕其匹”^⑫。刘逢禄还自觉地以继承从董仲舒、何休至庄存与的公羊学统绪自任，撰写了《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⑬，并对以公羊变易学说“经世”的宗旨反复致意，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而略微言”。刘逢禄著述很多，于各经都有撰述；所撰各书，“条理精密”，“不欲苟为恢诡”，有例证，有判断，连最厌恶今文经学的章太炎也赞赏刘逢禄“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⑭。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诸经传才有了比较全面地阐述，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因此，刘逢禄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刘逢禄所阐发的“春秋义法”和“通经致用”的学风，在嘉道之际吸引了一大批厌弃训诂形声而有志于经世致用的敏感士子，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故纸堆转向活生生的、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使今文学派大张其军，并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⑮。由于庄存与和刘逢禄都是常州人，所以此一学派又被称为“常州学派”。不过刘逢禄仍有相当浓厚的经生气，过分拘泥于家法师说。他在发掘今文经学注重经世、强调变易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承继了今文经学的许多糟粕，如相信汉儒的“天人感应”之说、主张以《春秋》决狱等。

在刘逢禄之后，把今文经学大大向前推进的，是刘逢禄的两位弟子龚自珍和魏源。“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⑯他们继承发展了刘逢禄“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既鄙弃一味训诂形声的汉学，也藐视空谈心性的宋学，“以经术作政论”，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

龚自珍虽然早在12岁就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许氏说文部目图解，奠定了“以经说字，以字说经”的考据基础，但少有大志的他却不屑做一偃行文字的无用腐儒。目睹当时社会的各种腐败现象和深重的社会危机，龚自珍敏锐地预感到“乱亦竟不远矣”^⑰，因此“慨然有经世之意”。二十四五岁即写成《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经世雄文，大胆地宣告清王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

倡言“更法”。他向统治者建言：“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⑱“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为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多也。”^⑲龚自珍的“更法”之议，深契于今文经学“三统”、“三世”的损益因革之义。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参加会试，落第后留京从刘逢禄“问公羊家言”，明西汉微言大义之学，这是龚自珍走向今文经学的转折点。从此，龚自珍开始自觉运用今文经学的“微言”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成为今文学派的一位健将。然而，与庄存与、刘逢禄不同，龚自珍虽“以《公羊》义讥切时政”，却并不奉《公羊》为金科玉律，也不胶著于师法家法。即使是对《公羊传》和公羊学大师何休，也敢于提出异议。他说：“公羊氏失辞者二，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庆父弑二君，罪百于牙，鸠牙也是，逸庆父也非；逸庆父是，则鸠牙也非。二者安所据？赵盾匿穿，何以书弑？二者安所别？周公诛管、蔡，季友得匿庆父，二者安所正？一以为道，一以为律，皆异吾所闻。”^⑳对今文经学的一些糟粕，如西汉的好言五行灾异、东汉的以谶纬附会经义等，都持批评态度。龚自珍研讨公羊学，汲取的是公羊学关注现实政治的“微言”精神，着重阐发的是“公羊三世说”的变易进化史观和“三统”因革损益的改革思想，并将之作为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呼唤“更法”的思想武器。他继承并发展了庄存与、刘逢禄“通经致用”的学风，进一步主张要“通乎当世之务”，“不必泥乎经史”。他说：“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㉑他本人身体力行，究心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研究，为倡导嘉道年间学风的转变作出重要贡献。龚自珍经世致用的主张和实践，恰恰反映了今文经学由发挥经义到议论时政这一历史性深刻变化。清人张维屏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㉒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都十分准确地概括了龚自珍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魏源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健将，和龚自珍一道同受《公羊春秋》于刘逢禄。两人感情深厚，对学术思潮变迁和所处时代的看法也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与龚自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锋芒毕露的风格相比较，魏源的著述学术色彩更浓。他著有《公羊春秋论》《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今文学专著，来反驳钱大昕等汉学家对《公羊传》的责难，阐发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张大了今文学派的声势。他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中明确指出：“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言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此鲁一变至道也。”^㉓借“复古”的名义，推动当时的学术思潮从重考据的古文经学，向强调发挥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转变。和龚自珍一样，魏源阐发今文经

正是通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创造性改造,嘉道之际复兴的今文经学才逐渐脱离经学的束缚,而与改革封建弊政、变法图强的经世思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一支生力军。而肇始于乾嘉之际的经世实学,也由于这支生力军的加入而蔚为大观,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其显著标识,便是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为代表的道咸经世派的形成与崛起。

②① 《清史稿》卷 486,《梅曾亮传》。

⑧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第 39 期。

(责任编辑 吴友法)